

梵蒂岡
的
反動思想與
政策

申 曼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系統的論述，徹底暴露梵蒂岡的醜惡歷史、階級本質及其反動的思想體系、政策方針以及歷來在國際上的反革命陰謀。關於近年來梵蒂岡充當美帝國主義鷹犬，領導世界各國的反動教徒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舉行間諜活動與破壞陰謀的事實，也有詳盡的揭發。

版 權 所 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1953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53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318×438 1/32 · 163,000字 · 總號1003 · 分號Q558

1—8,000冊 · 定價7,500元

· 發行者 ·

新 華 書 店

М. М. ШЕЙНМАН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АТИКАНА НА
СЛУЖБ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譯出

目次

第一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梵蒂岡	一
第二章 梵蒂岡的反動思想	三
梵蒂岡——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辯護者	三
梵蒂岡擁護剝削者的統治	三
梵蒂岡——資產階級國家的衛兵	四
教廷對社會的蠱惑性宣傳	四
梵蒂岡——民主制度的敵人	五
梵蒂岡——法西斯匪幫的同盟者	五
梵蒂岡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憎恨	六
教廷對先進科學的鬥爭	六
中世紀的理想化	六
偽裝「第三勢力」的帝國主義反動派	七
梵蒂岡戰後的反動計劃	九
第三章 梵蒂岡戰後的反動政策	九

煽動敵視蘇聯及國際民主陣營是梵蒂岡政策的主要內容.....	九
梵蒂岡——人民民主國家的公敵.....	一〇
梵蒂岡在德國的反動政策.....	一三
梵蒂岡建立天主教國家的計劃.....	一四
梵蒂岡幫助美帝國主義者鞏固在意大利的地位.....	一五
梵蒂岡在法國的代理人.....	一七
梵蒂岡與「南歐聯盟」.....	一八
梵蒂岡支持美國建立「遠東聯盟」的計劃.....	一八
梵蒂岡爲美帝國主義服務.....	一九
第四章 天主教會的機構與財富	二〇
梵蒂岡的機構.....	二〇
梵蒂岡——一個極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組織.....	二三
第五章 天主教陣營的分裂	二三

第一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梵蒂岡

梵蒂岡——位於羅馬而以教皇爲首領的國際天主教會領導中心——在世界上各種教會組織中間佔有特殊的地位。在國際舞台上兩大陣營——民主陣營與反動陣營——的鬥爭中，梵蒂岡夥同各國的天主教高級僧侶都站在反動勢力與戰爭販子的一方。同時，它還廣泛地利用宗教來掩蔽其反動的政治目的。

今天，資產階級的、特別是天主教的評論家與歷史家，都在極力地這樣顛倒是非：彷彿梵蒂岡是「超階級」的，彷彿它是「恥於」政治鬥爭與政治利益的。天主教的及其他資產階級的出版物，硬說梵蒂岡所關懷的只是宗教、善行和「全人類的」福利。顯然，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在很多世紀的過程中，天主教會的上層分子一直都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恩格斯寫過：在中世紀的歐洲「僧侶分化成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僧侶中的封建的教權階層形成貴族階級：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長、副修道院長和其他高級教士。這些教會中的高級官長，有的本身就是帝國諸侯，有的則像其他諸侯的家臣一樣，管轄包含無數農奴與屬民的廣大領土。他們不僅像貴族與諸侯那樣殘酷地榨取自己的屬民，而且

實行起來達到更爲無恥的情況。他們爲了掠奪屬民的最後一文錢以擴充教會的產業，不僅用殘忍的暴力，而且用宗教的一切陰謀詭計；不僅用酷刑的威嚇以及咒逐出教會或拒絕赦罪的威嚇，而且用一切悔罪的詭譎伎倆。偽造文書是這些高貴人物最常用和最愛用的敲詐手法。雖然在一般的封建賦役與捐稅之外，還徵收什一稅，但這些收入仍不够他們揮霍的。爲了從人民手中奪取更多的金錢，他們就求助於製造奇形怪狀的神像與聖物，舉行聖地進香，販賣免罪券，他們利用這些方法，曾在一個很長時間內有很大的收穫。」〔二〕恩格斯又繼續寫道：「正如在諸侯與貴族之上有皇帝一樣，在高級與低級僧侶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對皇帝要繳納『百一稅』……等貢賦一樣，對教皇也要繳納一般的教會稅，以供羅馬教廷的揮霍。」〔三〕

在一八七〇年以前，教皇不僅領導天主教會，不僅統轄所有僧衆，而且也是教皇領——教皇國，位於今日的意大利——的獨裁統治者。這個國家的首都都是羅馬。教皇領是個神權國家，以教皇爲首的僧侶無法無天地統治着它，極反動的制度使它「揚名於世」。

教皇與天主教高級僧侶專好教訓世界人民，告訴他們如何建立生活。在汗牛充棟的教書告示和其他言論中，最近半世紀來的歷代教皇，都是誹謗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同時提出他們自己的「理想社會的建設計劃」。看樣子，對他們最簡單的辦法似乎就是引用千餘年來教皇所領導的那個國家的經驗了。然而，在過去的千年當中，天主教會曾

有過充分的可能性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社會的建設計劃」的，而結果並沒有實現。

上述教皇國是怎樣一個東西呢？在中世紀的歐洲，它不同於其他封建國家的，就是它的反動制度特別反動，它的矇昧主義統治特別黑暗，它對人民羣衆駭人聽聞的壓迫特別慘酷。一直到它的末日，都是這樣。

教皇國的人口，在十九世紀中葉曾經達到三百萬人。作爲一個神權國家，那裏一切政權都集中在僧侶手中。教皇國的元首是教皇——獨裁的統治者。各行省由行使省長職權的紅衣主教與主教管轄。根據當代人的證明，他們都是些貪財的暴君。羅馬省長是個僧侶。警察與軍隊也都是由僧侶統率。軍隊是僱傭的。整個的國家機構自上而下都以貪污聞名。科學研究遭禁止。書籍出版要聽命於那窒息科學思想的教會的檢查機關。主持國民教育的是由十二個紅衣主教（在天主教教階中僅次於教皇的一種高級職位）所組成的「科學聖會」。不言而喻，它並不是在教育而是在愚昧人民。學校裏的教員都是些不學無術的神甫。主管大學的是些耶穌會士。在法庭上作審判官的是主教與神甫。到處都是無法無天；在教皇國內甚至沒有法典。宗教裁判所高於一切法庭，它除了教皇的個人權力外，不承認自己上面有任何權力，教皇的屬民受到捐稅的重壓，居民生活在難以形容的貧困中。

在教皇格列高理十六世（自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六年在位十五年）時代，「各行省都處於戒嚴狀態；軍事法庭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工作，監獄與流放地充滿囚犯；絞刑架和

斷頭台互相比賽殺人」(三)。教皇被那些諂媚者和奸佞羣小所包圍。皇族生活在酒肉徵逐之中。教皇格列高理十六世與庇護九世的親信是紅衣主教安多尼。他實際統治了教皇國達二十五年以上。安多尼出身於強盜家庭，他「身後留下私產值一萬萬（法郎——著者），其中三千萬爲鑽石與其他寶石」(四)。

教皇國絕大多數的臣民都憎恨自己的君主和其他僧侶統治者。在教皇領境內，時常發生反抗耶穌會士壓迫與教徒霸權的人民起義。他們對這些起義經常利用外國軍隊來殘酷鎮壓。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教皇國內湧起了反抗教皇政權的廣大運動。有一個時期人民曾指望在一八四六年當選爲教皇的庇護九世可能實行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可能參加意大利的統一並參加反抗外國奴役者奧地利人的戰爭。人民羣衆要求制定憲法，要求將國政移交給政權（教權之對）管理，要求將耶穌會士逐離國家機關，要求赦免成千成萬被教皇政府監禁和放逐的囚徒和流犯。

一八四七年四月，俄國駐羅馬公使布且涅夫向彼得堡報告說：有很多的呼籲書由各省遞到羅馬來；人民「懇求教皇迅速實現前此所許諾的改良措施，並大胆指出某些最必要的改革，如改組市政會議，建立國家財政管理的監督制度，解散政府所僱用的瑞士近衛軍，組織人民近衛軍以維持社會治安……最後則要求組成早經許諾的能在教皇的直接領導下管理國家行政的內閣」(五)。

正如布且涅夫在同一緊急報告中所報稱的：教皇專制政權的維護者最害怕爲「減輕

人民極沉重負擔與彌補國家赤字」而實行改革的時候，勢必要觸犯僧侶、特別是修道院的財產。「由耶穌會士所領導的這一類人，在羅馬勢力強大，人數也多，他們當然是敵視教皇政府的一切讓步，也敵視自由主義的要求的，儘管那些讓步與要求很微小。」⁽²⁾

教皇國內人民羣衆反抗耶穌會士統治的鬥爭，是與全意大利人民爲統一意大利與擺脫外國支配的民族解放鬥爭緊密地聯繫着的。教皇國的存在是意大利統一的嚴重障礙。

一八四八年二月，布且涅夫報告關於羅馬人民遊行示威的情況說：「數日來，人心的激動……大大地加劇，人們傳遞着有許多人簽名的呼籲書，要求教皇立即欽賜一個憲法並建立一個完全由俗界人士組成的政府。」⁽³⁾除了其他口號，布且涅夫繼續說，遊行着並高呼：「共和國萬歲！」一八四八年七月，羅馬所舉行的人民示威的口號是：「打倒紅衣主教與教皇，臨時政府萬歲！」⁽⁴⁾由此便可看出，教皇國人民對其僧侶統治者是何等的「愛戴」了。布且涅夫關於在羅馬遊行示威時人民曾企圖燒燬教皇宮殿的報告，也可以作爲這種「愛戴」的證明⁽⁵⁾。

庇護九世終於不得不同意在國家行政上實行一些改革；但同時他又秘密商請國外列強實行武裝干涉來鎮壓人民運動，並準備隨時逃離羅馬。一八四八年五月「英駐那不勒斯公使即已獲悉，教皇曾詢問那不勒斯國王，假如他由羅馬逃出，可否居留那不勒斯王國」⁽⁶⁾。同年十一月，教皇化了裝乘着巴伐利亞公使夫人的馬車趁夜由羅馬逃走。於是羅馬宣佈成立共和國。於一八四九年二月九日成立的國會，通過了剝奪教皇政權的法

令。法令內稱：

「第一條：教皇對羅馬國的政權已在事實上與法律上被剝奪。

第二條：羅馬教皇可獲得爲自由執行其教權所必需的一切保證……」

羅馬共和國被武裝干涉者鎮壓了。在外國軍隊的保護下，庇護九世於一八五〇年復活節前又重返羅馬。於是開始了前所未聞的「神父」恐怖，全國政權又重歸耶穌會士。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死刑，近三萬人逃出了教皇領。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九日，庇護九世發佈了一個通諭（告教會書），其中宣稱：凡是反抗教皇政權的人一定要受到詛咒。但詛咒並無濟於事，到一八六〇年年底，教皇領境內的大部居民都已擺脫了耶穌會士的統治。

留給教皇的還有羅馬（市）及羅馬省，教皇國的其他領土都劃入了意大利王國的版圖。

教皇的政權愈削弱，庇護九世教皇「陛下」就愈反動。法國的歷史家德畢都爾寫道：「國務卿紅衣主教安多尼的反動與專制的影響，已使他（指庇護九世——著者）成爲新思潮的盲目的與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混淆了政府與宗教，教權與政權，經常居心利用宗教這一武器以達到純政治的目的，或以信仰爲名要求政權援助他。」（二）

一八六四年教皇頒佈了一個「異說提要」——即天主教會所指責的所謂「謬論」的一覽表。凡是不贊同中世紀的教會教義和教皇覬覦社會上統治地位的主張的人，都受到指責。而遭教皇誹謗得最厲害的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個「異說提要」堅決地指責

科學以及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對異端的寬容等等。它堅持教權高於政權，要求讓教皇握有無限的權力，要求讓天主教會握有領導教育事業的特權。「誰要是說羅馬教皇可以而且應該與進步、自由主義、近代文明妥協並取得協議，那他就要受到咒逐」，——上述「異說提要」這麼說。

在一八七〇年八月當法國軍隊撤出教皇領之後（由於普法戰爭），羅馬就爆發了反抗教皇政權的人民起義。意大利國王懾於起義之繼續擴大，便派兵進駐羅馬。於是羅馬便成了意大利的首都，教皇的政權被剝奪，教皇國的領土也因之歸屬於意大利王國。

此後不久，在羅馬舉行了一次人民投票，首都居民贊成羅馬歸屬意大利王國的有四萬零七百八十五人，僅有四十六票贊成羅馬歸於教皇；在羅馬省內贊成歸屬意大利王國的有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一人，而贊成保留教皇政權的僅一千零五十七人。庇護九世把所有參與剝奪其政權的人詛咒一番之後，退居自己的宮殿並宣佈自己為「囚徒」。於是教皇國的生命就此告結束了。

在這以前不久，即一八七〇年七月間，教皇所召開的一次梵蒂岡教廷會議曾通過了關於教皇永無謬誤的教條（教理要點）。這意思就是說，教皇以天主教會首腦的身份所做的一切，他在「教壇」上所說的一切，每個信徒都應該誠惶誠恐地全部視為當然而不得加以批評，以免遭擯斥。根據這一教條，一切信徒對於當代教皇前此與法西斯強盜聯盟、對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他成為軸心國的同盟者時所採取的卑鄙可恥的立場，

對於他同金融資本家聯盟以及參加煽動新戰爭等等行爲，也應當認爲是「永無謬誤」的了。永無謬誤這個教條意思就是要求讓教皇及天主教會對一切社會生活以及每個天主教徒的私生活握有絕對的權力。

於一八七八年接替心胸狹窄的反動分子庇護九世教皇位的良十三世瞭解到：如果再繼續前人的政策勢必要使教皇的權勢更爲衰落。良十三世在位時間由一八七八年到一九〇三年，這是工人運動大規模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廣泛傳播的年代。

反動的資產階級被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所嚇倒，而用緊急法令、通緝、監禁等等手段來對付它。社會主義影響的高漲也嚇壞了教皇。比庇護九世更爲狡猾的良十三世認爲：原爲封建社會的教會的天主教會，必須轉而服務於資產階級，並且要更積極地幫助它對抗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良十三世於一八九〇年寫道，爲了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進行鬥爭，單靠國家一種力量是不夠的：沒有教會的幫助，任何法律、法庭、軍隊、警察都不能對付這種運動。良十三世在一系列的教書中都對社會主義進行了誣蔑。爲了分裂工人階級，他命令教士輩進行建立受教會監督的天主教工人組織。良十三世曾力求和最反動的政治家如俾斯麥、亞歷山大三世、威廉二世以及法國的反動資產階級等締結同盟，以便合夥對抗社會主義。爲了這個目的，他甚至願意同意大利政府締結協定，但要求以恢復教皇的政權爲條件。

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封建社會的堡壘的天主教會，自十九世紀末葉起，便日益緊密

地同資產階級結合起來了。梵蒂岡一方面保持着同歐洲各國貴族封建集團的全部聯繫，同時又日益密切地同資本主義世界聯繫起來。促成這種情勢的是：天主教會的主要支柱——大地主貴族在歐洲也是到處更加緊密地和工業與金融資產階級結合起來了。天主教會的高級代表人物——紅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擁有大量教產的修道院院長、教團首腦等，照例是由這些階層應募而來的。教會在財政上對資產階級的依賴逐漸增加，也是促成梵蒂岡及全部天主教會與資產階級相結合的一個不小的原因。以教皇爲首的天主教會，在中世紀是最大的地主；到帝國主義時代，它又成了最大的資本家了。

自十九世紀末葉起，教皇陣地之所以加強，是由帝國主義的特點造成的。列寧寫道：「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各方面的反動，是……使民族壓迫加強起來。」（三）歐洲「已進到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寫道，「此時統治的資產階級因害怕日益增長強固起來的無產階級，而支持一切落後的、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衰老的資產階級與一切衰敗了和衰敗着的勢力聯合起來，以求保存陷於動搖的僱傭奴隸制。」（四）天主教會和它用以影響羣衆的全部機構，都成爲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爭取保存僱傭奴隸制的鬥爭工具之一。教皇及其龐大的教會組織，因爲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以反對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爲其活動中心，所以它對反動資產階級也就更有用了。

教皇對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的仇恨，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更變本加厲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寫道：

「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不可遏阻地高漲着，把帝國主義各個要塞包圍起來了，其吼聲在被壓迫的東方各國正在引起回響。帝國主義立足之地燃燒起來了。帝國主義已註定不可避免滅亡。」〔25〕

當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動員了一切力量來鎮壓本國的革命，並組織對蘇俄的軍事進攻。天主教會也積極地參與了這一進攻的佈置。它參加佈置武裝干涉，並廣泛利用宗教去挑撥對蘇維埃國家的仇恨，去誹謗社會主義。梵蒂岡支持了俄國的白衛匪軍，並於一九一九年準備會同帝國主義國家政府，承認高爾察克爲「俄國執政者」。紅軍粉碎了高爾察克匪幫之後，才打破了外國干涉者及教皇的這一個計劃。梵蒂岡支持了那些企圖征服與分割俄國的帝國主義者的各項計劃。他按照這些計劃，幫助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別特留爾匪幫。他幫助帝國主義者將波蘭與波羅的海沿岸變成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防疫帶」。教皇駐華沙的代表阿奇爾·拉蒂主教（即後來的庇護十一世教皇）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成了陰謀活動的中心，波蘭反動集團夥同英、法、美的代表就在他那裏製造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陰謀。梵蒂岡在支持武裝干涉的同時，並指示住在蘇俄境內的天主教僧侶多方面進行反抗蘇維埃政權，並利用教會作反革命活動。

反對蘇維埃國家及全世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鬥爭，已成了梵蒂岡的基本任務。教皇全部的宗教與政治活動，都服從於這個反人民的反動目的。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梵蒂岡都是依附於資本主義陣營中的侵略性最大

的最反動的勢力。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教皇在致匈牙利天主教首腦切爾諾赫紅衣主教的信中，對該國的鎮壓革命表示興奮。大部分的天主教僧侶都直接地參加了對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匈牙利神甫庇姆（即後來的明曾蒂紅衣主教，於一九四九年因組織反匈牙利人民的陰謀被判罪）早在那時候就已經表現為勞動人民的死對頭了。梵蒂岡曾迫不及待地同霍爾第政府、同匈牙利人民的劊子手們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在這個政權存在的二十五年期間同他們保持了最親密的關係。

由於仇視國際工人運動和蘇聯，梵蒂岡與墨索里尼結成了同盟。梵蒂岡幫助意大利的法西斯匪幫奪得政權。法西斯獨裁建立之後，庇護十一世與墨索里尼之間便開始了秘密談判，商談如何解決意大利與梵蒂岡之間一八七〇年所發生的糾紛。談判結果，於一九二九年簽訂了拉特蘭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羅馬的一小部分土地宣佈為獨立國，國名為「梵蒂岡教皇國」。教皇為該國的全權主宰。條約責成意大利賠償梵蒂岡因前教皇國於一八七〇年被推翻而遭受的損失，為數七億五千萬里拉的現款，與十億里拉的有價證券。

現在的梵蒂岡教皇國，有臣民約千人，他們都是梵蒂岡各機關裏的職員。這僅僅是個「象徵的」國家，但教皇與世界資產階級都需要它：教皇國的建立是為了鞏固天主教的威信，為了促使梵蒂岡更進一步以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忠實同盟者的身份參與國際政治。

梵蒂岡的活動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反動勢力的活動密切相結合着的。以拉特蘭條約爲標幟的梵蒂岡與意大利法西斯匪幫的同盟，一直繼續到墨索里尼血腥統治垮台爲止。根據梵蒂岡的指示，意大利的天主教僧侶都誠心誠意地爲墨索里尼服務。一九三五年末當意大利開始對阿比西尼亞發動侵略戰爭時，以米蘭大主教舒斯特爲首的意大利僧侶，經教皇的贊同，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軍事沙文主義運動，到處宣揚墨索里尼的戰爭計劃。梵蒂岡並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來幫助意大利的法西斯匪幫。

梵蒂岡與德國法西斯匪幫也同樣締結了同盟。它之所以和希特勒匪幫勾結，是因爲他們彼此都是民主制度與蘇聯的死敵。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教皇駐德國聖使（大使）爲歐根尼·派契利主教（一九三九年起成爲庇護十二世教皇）。他與德國工業家及地主中最反動的集團保持着密切聯繫，並多方幫助他們鎮壓德國的革命運動。派契利推動當時在德國頗有勢力的以神甫卡阿斯爲首的天主教中央黨，使它更加右傾。派契利早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前幾年，當時他已昇任梵蒂岡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即曾督促德國的天主教教徒與天主教黨去跟法西斯匪幫相勾結。一九三三年七月間，梵蒂岡同德國簽訂了條約。這是教廷與希特勒匪幫之間團結一致的一個表示，是它們之間的一個合作條約。在這個匪幫之中就有着不少的天主教徒，如希特勒、哥培爾、戈林、澤斯·恩克瓦特等等戰犯都是。但教皇想也沒有想過要革除他們的教籍。

戰後的資產階級出版物，企圖證明梵蒂岡是「敵視法西斯主義的」。這些出版物拿

以往個別時期梵蒂岡同意大利政府、同德國政府之間發生過的一些糾紛作例證。不錯，糾紛確是發生過的；原因之一就是教會拚命想爭得教育青年的首要地位。但這些糾紛既未涉及梵蒂岡與法西斯制度間之相互關係的根本問題，也沒有涉及梵蒂岡對法西斯匪幫態度的一般問題。每次爭論都是協議了事，並且總是梵蒂岡遷就法西斯政府的要求，因而始終都和它們保持着密切的聯盟。

「神父們」始終擁護希特勒匪幫的各種血腥罪行。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梵蒂岡國務卿派契利會致函希特勒派駐梵蒂岡大使別爾根，表示「宗座」很滿意希特勒的制度及其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之危險」的鬥爭。派契利續稱：梵蒂岡也進行了同樣的工作，只不過用的是另一種方法——「用宗教的手段」；但他又承認在同「布爾什維克危險」作鬥爭當中，「非常的鎮壓手段」也是起重大作用的。派契利的這封信，暴露出梵蒂岡政策的本質，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仇視民主制度與共產主義，並決心同工人階級的一切敵人結成聯盟。

以上述同樣的原因，梵蒂岡與高采烈地歡迎了佛朗哥將軍的叛亂。匪徒佛朗哥，西班牙反動派及國際反動派的走狗，竟被教皇不高不低地封為「新救星」。

在戰前，梵蒂岡支持了法國的法西斯保皇派——「法蘭西行動」派。它通過一部分有勢力的天主教人士，鼓動法國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階層同法西斯德國友好合作，以共同進行反對蘇聯及國際工人運動的鬥爭。